

文艺学系列教材

ZHONGGUO

中国

古代文论

主 编 李建中

GUDAIWENLUN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北京大學出版社

中

國

古代史

1999

GUDAIN ENLUN

文艺学系列教材

ZHONGGUO GUOWENLUN 中国 古代文论

李建中 主 编

编写（以姓氏笔画为序）

邓新华 向柏松 吴建民

吴 艳 李建中 胡立新

董 玲

2002年·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鄂)新登字 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论/李建中主编. —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9

ISBN 7-5622-2594-X/I·186

I. 中… II. 李… III. 古代文论 IV. 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数据核字(2002)第 1 号

文艺学系列教材

中国古代文论

© 主 编 李建中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编:430079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经销

武汉市科普教育印刷厂印刷

责任编辑:马元龙

责任校对:崔毅然

封面设计:甘 英

督 印:方汉江

开本:787×1092 1/16

版次: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数:1-5000

印张:23.75 字数:38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5.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古代文论》序

王先霭

中国文学批评史这个学科是由在大学里的学者们建立的,他们的研究和教学同步进行,他们的著述,有很大一部分是作为教材出现,开初如此,至今依然。李建中教授主编的这本《中国古代文论》,是一个新的尝试,新的成果。

这门学科诞生于20世纪前期,十分年轻,另一方面,它却承袭了两千多年悠久的传统,有着绵远漫长的史前史。它的古老,是由于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学历史的悠久,是由于中国人对文学的议论和思考的历史的悠久;它的年轻,是由于原先没有诞育的客观条件,最主要的是由于我们的古人缺乏明确的学科意识,系统的严密的学科的建立只能是在现代来实现。两千多年来的文学理论批评论述,蕴藏在各朝各代浩如烟海的典籍里面,要发掘和鉴别它们,需要借助古典文献学的帮助;文学理论批评与文学创作相伴而生、相随而长,研究文学理论批评史又依赖着文学史研究的进展;尤其重要的是,前人的论述的价值,要从一定的理论立场出发去判断,决定去取,阐发其内涵并给与评价,作为学科据以立足的出发点,这种理论立场当然应该是发展成熟的、完备的某种立场,所以,只有有了严密的、体系化的现代文学理论,有了对于“文学”和“文学批评”的明确的、深刻的认识,才有可能建立文学批评史学科。这就是为什么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才出现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原因。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中国文学批评”存在的根据,在什么意义上我们确认它的存在。现在得到学界普遍认可和遵行的“文学”的概念,就其理论内涵而言,基本上是20世纪之初,从欧洲引进的。西方的“文学”概念,从西方文学几千年的实际里提炼而出,西方文学的实际和中国几千年文学的实际并不完全相同,而是有着不小的差别。亚里斯多德的《诗学》讨论的文学的类型是史诗和悲剧,从孔子到刘勰都没有见过较为严格意义上的史诗和悲剧,

因此,孔子、刘勰的文学观和亚里斯多德相差很大,中国古代的文学观和欧洲古代的文学观相差很大。20世纪中国的学者以亚里斯多德以来欧洲“文学”观念为参照的标尺,重新审视、整理孔子以来关于“文学”的议论,在开辟新境界的同时,一开始在对象内容的取舍、评价上的扬抑和诠释的向度等方面也就有圆凿方枘的困惑。不仅批评史研究如此,这也是当时中国人文学科研究者普遍的困惑。冯友兰说:“哲学本一西洋名词。今欲讲中国哲学史,其主要工作之一,即就中国历史上各种学问中,将其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选出而叙述之。”^①中国的历史上,是不是存在与西洋人所谓的“哲学”或“文学批评”等同的学问呢?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而在20世纪前期,还只能借用西洋人的眼光,作为近现代意义上学科门类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哲学史”是以西方文学、史学、哲学的学科构架和概念系统为规范来建立。于是,本土思想资料的实际和外来的学科模式之间的距离和冲突,是学者们越来越尖锐地感受到的一大难题。七十多年来,在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发展的历程中,在解决这一难题的过程中,对本土古代思想资料的发掘整理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文学观念大大地深化和细密化,而两者的结合和相互促进也不断出现新的路径和形态,当然,不免在新的层次上遭遇新的困境,给研究者提出新的课题。我们回顾七十年来的学科史,本身就需要有历史的眼光和态度,既不能苛求早期的拓荒者、奠基者,更不能扼制新进们创新的努力。本书作者们力图在反映学术进展的同时,提供新的视角,我认为,他们的劳作是应该肯定的。

古代人求知、治学,研究自然和社会,很长时间内没有自觉的学科区分。大家都向纵横两方尽力延展,都想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国读书人长期信奉“一物不知,儒者之耻”^②的原则,欧洲11世纪到14世纪的经院哲学、特别是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的后期经院哲学,内容同样是无所不包。大约从17世纪开始,欧洲的自然科学逐渐分成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生物六大学科,并且其后不断在重新分化、组合。到了18世纪中期,又形成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社会科学学科。人文学科出现较早,在文艺复兴以前,原先是神学的对立物,进入20世纪,才作为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并立的学科类型。在上一次世纪交接之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61年新一版,第1页。

② 汉代扬雄《法言·君子》:“圣人之于天下,耻一物之不知。”崔瑗《河间相张平子碑》:“一物不知,实以为耻。”《南史·陶弘景传》:“读书万余卷,一事不知,深以为耻。”

时,科学研究的规范从西方传到中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些学者致力于文学研究的科学化,并从文学研究的大学科里产生出若干分支学科;对于中国古代文学和文学批评的研究,也分别划出若干专门的领域,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尝试于是紧随着文学史、戏曲史和小说史著述的问世之后出现。

最先拿出这方面成果的,不是中国学者,而是外国学者,是欧洲的和日本的汉学家。德国人威廉·顾路伯(Wilhelm·Grube,1855—1908)1902年在莱比锡出版了《中国文学史》,20世纪日本早期汉学家盐谷温著有《中国文学概论》,两书中都略有关于文学思想的介绍。另一日本汉学家铃木虎雄1925年由东京弘文堂出版的《支那诗论史》,为三篇长篇论文,即《周汉诸家的诗说》、《魏晋南北朝的文学论》和《格调、神韵、性灵三诗说》的合集。铃木的论述中可看出19世纪欧洲文艺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就是唯美主义超功利的文学价值观的影响。重视文学的独立性、特殊性,或隐或显地承认文学的某种程度或某些范围的超功利性,导致将对文学的审美的观照从哲学、伦理学、政治学附庸地位中解脱出来,将文学批评史从哲学史、政治史、道德史中离析出来。日本学者的著述,欧美文学思潮的直接和间接的触动,帮助中国学者从经学的拘束中解脱,把文学当作文学,当作不同于伦理、政治的审美活动,把文学理论批评当作文学理论批评,不同于一般的人生论、社会论。这种思想范式的转型是中国现代学术建立的前提,其他学科如此,中国文学批评史也是如此^①。

铃木从文学整体出发研究文学批评,他的思考较为深刻和富有活力。无可否认,他的这本著作,不论从时间的纵向线索还是文体的横向幅度看,都很不完整。他本人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说:“……至于以‘诗论史’而不以‘文学理论史’为名,是因为论述主要在于诗的方面。此外,书中对唐宋金元部分的论述过于简略,对清代嘉道以后时期尚付阙如,而对这些阙遗之处的补充,或者进而更改书名,修改充实成为《中国文学理论史》,则有待于日后的努力了。”他所期待的努力,由中国学者自己实现,此书出版之后两年,陈中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就问世了。

^① 鲁迅1927年9月在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讲演中说:“用近代的文学眼光看来,曹丕的一个时代可说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或如近代所说是为艺术而艺术(Art for Art's Sake)的一派。”“曹丕和曹植表面上似乎是不同的。曹丕说文章事可以留名声于千载;但子建却说文章小道,不足论的。据我的意见,子建大概是违心之论。”

“五四”以后的时期,是现代学科建设的发轫期。胡适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到,他们那一代人,企图在中国文化史上“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这个“革命”有两大目标,一个是中国文学史,一个是中国哲学史(或者叫中国思想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恰是两者的交切与结合。形容为哥白尼式的革命,是强调其“价值重估”(Transvaluation of values)的任务^①;而价值重估的出发点,便是新的观念,这也正是新学科建立的前提。一个学科要从未到有地建立,必不可少的是,提出对它的性质、基本概念的看法,并且要搭起一个哪怕是初步的框架。胡适一辈的学者,不是从对本土遗产的批判中生产出新的观念,而是从外面输入。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最基本的概念是“文学”和“文学批评”,对这两个概念的理解,也是从欧洲引进的。陈中凡肩起了用外来的新的“文学”和“文学批评”观念,重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论述价值、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框架的工作。紧接着,一批学者以各自的努力,共同奠定构建学科的大厦的基础。

陈氏何以想到撰著《中国文学批评史》呢?他的著述研究的心理动因和铃木虎雄等外国学者是否有所区别?据他在《自述》中说:“1921年8月至1924年11月,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兼教授,对当时的学衡派盲目复古表示不满,乃编国文丛刊,主张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是20世纪初期的一股潮流,所谓“科学方法”,乃是指由西方接受的现代科学研究方法论。和古人、同时代的一些人乃至后来的人有所不同,陈中凡不再局限于从目录学、文献学角度看待古来文学理论批评著述,1936年他和蔡尚思讨论编撰《中国思想史》,明确“序述各时代思想的体系、派别,及其演进的进程,是为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②。那虽然是几年之后的事,看来却也是他编撰《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指导原则^③。欧洲有文学理论批评学科,中国历代也有许多人提出过文学理论见解,因此有必要系统采择古代材料以见纲要,并各各探察其作为依据的原则。这就是陈中凡心目中文学批评史的最基本的内容。在学科建设的开端,他就已经尽可能兼顾到西方较为精密

①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47页。

② 原载199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之蔡尚思《中国思想史研究法》卷首,后收入《陈钟凡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③ 雷纳·韦勒克《近代文学批评史·导论》说,“批评史是一个有其内在意义的课题……它完全是思想史中的一个分支”,“我们的目的毕竟主要是对各种思想的了解”。见该书第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批评史是思想史,这显然是现代才有的学术观念。

的理论和汉语文学的特殊之处,这是十分可贵的。

陈氏著作出版后的第七年,即1934年,是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史上极其重要、极其辉煌的一年。这一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册,世界书局出版方孝岳的《中国文学批评》,人文书店出版罗根泽的《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在此之前,1931年,朱东润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批评史,其讲义数易其稿,194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他1935年之前在武汉大学《文哲季刊》上发表论文,其中有关文学批评史的有九篇,他的研究重点放在中古以后;郭著《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1944年出版,罗氏《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隋唐文学批评史》、《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1943年出版。这几部著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奠定了基础、建立了架构。几位拥有强大学术实力的学者不谋而合,几乎是同时发表精心撰著的各有特色的成果,一个新的学科终于建立起来了,他们是这个学科的奠基者,以上几部著作,是这个学科创建期的基石。

郭绍虞把乾嘉学风的传统和西方近代学术的实证精神结合,十分重视资料的收集整理,但他不是简单堆砌资料,而是把有准备、有目的地尽可能全备地搜集来的材料,作为研究的基础和出发点。

这里就涉及一个“循环”——要有独立的观念、见解,才知道到哪里去寻求材料,怎样考订、整理材料,才能对材料作出阐释;而观念、见解的形成、深化、检验和论证,都需要建立在材料的基础之上。古代原来缺乏系统的文学批评史材料,是因为古人缺乏明确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批评史的观念,甚至缺乏明晰的文学观念。郭绍虞首先从这一基本点入手,以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新的语境下对于文学、文学批评的认识为出发点,重新收集材料。研究者对文学、文学批评没有自己的见解,怎么决定寻找史料的方向,如何鉴别,如何弃取?然而古人对文学、文学批评的见解与研究者并不完全一样,他们彼此之间也不尽相同。倘若以今例古、强古从今、以古证今,那是没有任何积极意义的。这又给史料的发掘、选择出了难题。

郭绍虞治学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把文学理论批评现象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环境中进行研究,借助于其他多种学科的手段来研究。其批评史第四章“文学观念演进与复古之思想”开头说,“文学批评又常与学术思想发生相互连带的关系,所以学术思想风气之转移又常足以左右文学批评的主张”。周秦时代文学批评史与学术史难以截然区分,固不待言;六朝纯文学的思想得以建立、流播,也因了儒家学术思想的消沉;唐宋之后,讲载道,讲复古,文学思想均以学术思想为依归。尤为

可贵的是,他依仗自己对中国语言文字特性的深刻了解,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提出许多独到见解。本书作者们吸取前辈论著的营养,在这一点上给予了特别的关注。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经历了由客观主义向主体主义的转变。科林伍德史学理论的基本原则——“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影响深远。科学哲学的历史学派代表人物库恩再三强调,科学史必须依赖科学哲学,“科学史需要哲学,其理由是显而易见的。它们的基本工具不只是科学知识,而且还需要哲学观点”。“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握他所研究的时期和领域的主要哲学流派的思想,要对科学史中的许多重要问题研究得好,是不可能的。”(《必要的张力》)一门学科的历史不能只是描述单个的分散的历史事件、个案,它还应该具有解释性,具有系统性、整体性。也可以说,学科史的研究既要在学科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又要担负充实发展学科理论的任务。文学批评,本身是一种理性思维活动的成果,批评史家需要指明过去的批评家的思想何以能够提炼出来和怎样被提炼出来。科林伍德讥讽传统史学是剪刀加浆糊的剪贴史学,他认为:“历史想像力严格说来,却不是修饰性的而是构造性的。”(《历史的观念》)本书的作者们接受了更多的近现代史学观的影响,在“构造性”上下了更大的力气,显出了他们的学术个性。

本来,前辈们也是在不停地探索中前进。在早期出版的几种中国文学批评史中,罗根泽的一种是序言写得最长的,对学科建设的原则、前提、基础,作了认真而深入的论述。他对于为什么要研究文学批评史,有了比其他几家更加明晰的看法。他说:“我们研究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批评而言,固在了解批评者的批评,而尤在获得批评的原理;就文学而言,固在藉批评者的批评,以透视过去文学,而尤在获得批评原理与文学原理,以指导未来文学。”这很明显的比郭绍虞、方孝岳进了一步。文学批评史的主要功能,不是止于帮助人们深一步理解文学史,也不止于提供文学批评史料,帮助人们了解某个古代批评家的著作和观点,批评史的最高任务是总结历代人们在文学问题上理论思维的经验和成果,增进和提升对文学的形而上的把握与理解,最终落实到对于今后文学的指导,当然是包括对文学的创作、批评和接受诸多方面的指导。

本书作为新世纪的教材,力图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古代文论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粹。主编和各位作者多年来已经在这些方面做过系统性的研究,所以能够成一家之言,相信会对本学科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

目 录

《中国古代文论》序

(王先霭)

0 导论	(1)
0.1 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背景	(1)
0.2 中国古代文论的思维方式	(6)
0.3 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形态	(12)
1 先秦文论	(19)
1.1 先秦文论概述	(19)
1.1.1 先秦思想文化	(19)
1.1.2 先秦文化与文论	(21)
1.1.3 先秦文论的主要成就	(26)
1.2 孔子及儒家文论	(28)
1.2.1 孔子的文学思想	(28)
1.2.2 孟子的文学思想	(32)
1.2.3 荀子的文学思想	(35)
1.3 老庄及道家文论	(37)
1.3.1 老子的文学思想	(37)
1.3.2 庄子的文学思想	(40)
1.4 《易传》儒道兼综的文论思想	(45)
1.4.1 象与意	(46)
1.4.2 阳刚与阴柔	(47)
1.4.3 神与通其变	(48)
先秦文论选录	(50)

《老子》选录	(50)
《论语》选录	(53)
《孟子》选录	(57)
《庄子》选录	(60)
《易传》选录	(65)
2 两汉文论	(68)
2.1 两汉文论概述	(68)
2.1.1 两汉思想文化的基本状况	(68)
2.1.2 汉代思想文化对汉代文论的影响	(69)
2.1.3 两汉文论概况	(72)
2.2 《淮南子》的道家文论与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77)
2.2.1 《淮南子》的道家文论	(77)
2.2.2 司马迁的“发愤著书”说	(82)
2.3 《乐记》、《诗大序》和董仲舒的文论：儒家文论之总结	(84)
2.3.1 《乐记》的文艺思想	(84)
2.3.2 《诗大序》的诗歌理论	(89)
2.3.3 董仲舒的经学家文论	(91)
2.4 扬雄、王充的文学观和王逸的屈原论	(94)
2.4.1 扬雄的文学家文论观	(94)
2.4.2 王充的文学观	(96)
2.4.3 王逸对屈原的评论	(102)
两汉文论选录	(106)
论六家之要指	司马谈 (106)
史记·太史公自序(选录)	司马迁 (107)
礼记·乐记(选录)	(109)
诗大序	(112)
论衡·超奇	王充 (113)
楚辞章句序	王逸 (116)
3 魏晋南北朝文论	(118)
3.1 魏晋南北朝文论概述	(118)

3. 1. 1	从玄学兴盛到三教合流	(118)
3. 1. 2	魏晋玄学对文论的影响	(121)
3. 1. 3	魏晋南北朝文论的巨大成就	(125)
3. 2	玄学才性论与曹丕《典论·论文》	(128)
3. 2. 1	铨衡群彦, 品评才性	(128)
3. 2. 2	文气与才性	(132)
3. 3	陆机《文赋》的创作心理学思想	(136)
3. 3. 1	陆机和《文赋》	(136)
3. 3. 2	陆机论创作心理	(139)
3. 4	刘勰《文心雕龙》与三教合流	(144)
3. 4. 1	刘勰的三个世界及《文心雕龙》中的儒道释	(144)
3. 4. 2	《文心雕龙》的理论体系	(149)
3. 4. 3	《文心雕龙》的创作论和批评鉴赏论	(152)
3. 5	钟嵘《诗品》的诗歌理论	(157)
3. 5. 1	钟嵘及其《诗品》	(157)
3. 5. 2	钟嵘的文论思想	(160)
魏晋南北朝文论选录		(166)
典论·论文		曹 丕 (166)
周易略例·明象		王 弼 (167)
文赋		陆 机 (167)
文心雕龙(选录)		刘 勰 (170)
诗品序		钟 嵘 (177)
4	唐宋金元文论	(180)
4. 1	唐宋金元文论概述	(180)
4. 1. 1	三教思想的分立与融合	(180)
4. 1. 2	儒道释文化对唐宋金元文论的影响	(183)
4. 1. 3	唐宋金元文论的成就	(187)
4. 2	载道与取境: 唐代文论中的儒与道释	(192)
4. 2. 1	韩愈、柳宗元的文道观	(192)
4. 2. 2	白居易的儒学诗教观	(195)

4. 2. 3	皎然《诗式》与诗歌意境论	(197)
4. 2. 4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与诗境风格论	(200)
4. 3	苏轼、严羽及宋代文论的以禅喻诗	(202)
4. 3. 1	宋代道学家的文道论	(203)
4. 3. 2	苏轼融合儒释道的文艺思想	(204)
4. 3. 3	严羽《沧浪诗话》及以禅喻诗	(210)
4. 4	元好问及金元文论	(215)
4. 4. 1	金元文论的主要特征	(215)
4. 4. 2	元好问的诗论	(216)
	唐宋金元文论选录	(220)
	六祖坛经(选录)	慧 能 (220)
	诗式(选录)	皎 然 (222)
	与元九书	白居易 (226)
	答李翱书	韩 愈 (230)
	二十四诗品	司空图 (231)
	书黄子思诗集后	苏 轼 (235)
	沧浪诗话·诗辨	严 羽 (235)
	论诗三十首(选录)	元好问 (237)
5	明清文论	(239)
5. 1	明清文论概述	(239)
5. 1. 1	从程朱理学到阳明心学	(239)
5. 1. 2	阳明心学对文论的影响	(239)
5. 1. 3	明清文论的巨大成就	(243)
5. 2	从李贽到金圣叹: 异端思潮下的小说评点	(247)
5. 2. 1	李贽对《水浒传》的评点	(251)
5. 2. 2	金圣叹对《水浒传》的评点	(251)
5. 3	王骥德、李渔及明清戏曲理论	(254)
5. 3. 1	王骥德和他的《曲律》	(260)
5. 3. 2	李渔的戏曲理论	(263)
5. 4	王夫之、叶燮及明清诗词理论	(268)

5. 4. 1 王夫之的诗论	(268)
5. 4. 2 叶燮的《原诗》	(273)
明清文论选录	(279)
焚书 (选录)	李 贽 (279)
读第五才子书法 (选录)	金圣叹 (285)
曲律 (选录)	王骥德 (289)
闲情偶记 (选录)	李 渔 (294)
夕堂永日绪论内编 (选录)	王夫之 (303)
原诗 (选录)	叶 燮 (305)
6 近代文论	(314)
6. 1 近代文论概述	(314)
6. 1. 1 “过渡时代”的文化转型特点	(314)
6. 1. 2 “古今中西大交会”中的近代文论	(316)
6. 1. 3 近代文论的突出贡献	(319)
6. 2 龚自珍、刘熙载及传统文论之总结	(322)
6. 2. 1 龚自珍的文论思想	(322)
6. 2. 2 刘熙载《艺概》及近代词论	(325)
6. 3 梁启超、王国维及近代文论之开启	(327)
6. 3. 1 梁启超的文论思想	(328)
6. 3. 2 王国维的文论思想	(332)
近代文论选录	(336)
书汤海秋诗集后	龚自珍 (336)
艺概 (选录)	刘熙载 (336)
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	梁启超 (339)
《红楼梦》评论	王国维 (343)
人间词话 (选录)	王国维 (358)
后记	(362)

0 导 论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组成部分,古代文论的发生、发展及演变既以儒道释文化为思想背景和精神资源,而古代文论本身又是古代文化巨苑中一道靓丽的风景。中国古代文论从思想观念到范畴术语,从思维方式到理论形态,无一不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影响。遗憾的是,这一重要的文化事实并未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20 世纪已经问世的几部古代文论教材,或留意于“史”的梳理或倾心于“论”的辨析,却不同程度地忽略了古代文论与古代文化血肉相连的“史”、“论”事实。本书作为新世纪的新教材,力求紧紧扣住古代文论与儒道释文化的关系,在古代文化的思想背景和精神源流中,把握并阐释古代文论的演进脉络和理论精髓。沿着这一思路,本书力图在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层面揭示古代文论的理论意义和当代价值。

0. 1 中国古代文论的文化背景

古汉语“文化”一词的本义是“以文教化”。成书于战国时期的《易传》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唐孔颖达《周易正义》释曰:“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者,言圣人观察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以化成天下也。”以“人文”来“化成天下”,一方面构成“文化”一词“以文教化”的基本内涵,同时也隐含着“文化”与“文学”的某种天然联系。

“文化”与“文学”,都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它包括了物质制造(技术体系)和精神创造(价值

体系)两大部分;而狭义的“文化”则仅指人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①。大家知道,狭义的“文学”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语言的艺术”,包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而上古时期,所谓“文学”还是泛指一切见诸于“文”的东西,也就是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所说的“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的“人之文”。这种“人之文”也就是人类的精神创造。可见狭义的“文化”与广义的“文学”是相重合的,二者都包括了孔颖达所言“诗书礼乐之谓”,以及用诗书礼乐化成天下的精神活动即价值体系。当狭义的“文学”从广义的“文学”之中逐渐独立出来的时候,文学与文化的血肉联系已先在地铸成。

“文学”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先进》,孔门弟子按其才能特长分为四科,“文学”是其中之一,杨伯峻《论语译注》释曰:“文学——指古代文献,即孔子所传的《诗》《书》《易》等。”^②可见《论语》所说的“文学”既是儒家文化的组成部分,又是儒家文化精神的文本化。孔子和他的弟子们既是“文化人”也是“文学家”,其文化思想必然灌注于文学理论,其文学理论又必然涵泳于文化思想。不惟儒家,先秦“九流十家”皆然。

中国古代文化以儒家为正统,以道家以及后来传入中国的佛教为补充,儒道释或三水分流或三川汇一,共同构成中国古代文论的思想文化背景。

一 儒家文化

儒,上古写作“需”,像人沐浴之形。人为何要沐浴?准备参加祭祀活动。所以许慎《说文解字》说“儒,术士之称”,胡适称儒为“殷民族的教士”。最早的“儒”是以相礼治丧为职业的文化人,作为殷商苗裔的孔子年轻时也是以“儒”为业的。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儒成了一个重要的学派,其标志性特征就是以孔子为宗师,以孔子学说为宗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说儒家是“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最为高”。儒家主张“礼乐”、“仁义”、“忠恕”和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的“中庸”之道。政治上提倡“德治”、“仁政”和“王道”。重视道德伦理教育和个体人格的自我修炼及完善。重视文艺的伦理教化功能、哀怨讽谏作用和温柔敦厚风格。正

^① 关于“文化”的定义,请参见冯天瑜《中国文化史纲》,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2页;以及马敏主编的《中国文化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页。

^②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0年,第110页。